第一章

故 乡 时 光

家　　世

江西省萍乡县，是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历史悠久、能人济济的一方水土。公元 1897 年 11 月 14 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张国焘就出生在这个县上栗市桔木山（今萍乡市上栗区金山乡山明村）。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丁酉年，按照习俗，张国焘的属相是十二生肖中的鸡。

萍乡，相传因境内盛产“萍草”而得名，位于江西省最西部，东与宜春相邻，西与湖南省株洲、醴陵相接，南与吉安毗连，北与湖南省长沙、浏阳接壤。萍乡地处湘赣边丘陵地区，北峙杨歧山，南亘武功山脉，主要山峰有杨角尖、金顶（最高峰名白鹤峰）等，主要河流有表河、萍水、栗水、草水等。萍乡历史悠久，汉代属宜春县，三国东吴置县，元朝元贞初年升县为州，明朝复改为县后，一直延续下来。

萍乡境内煤炭甚丰，宋代已有轻刨而得、以煤代薪的记载。明末清初，土窿已初具规模。到了 1890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为燃料之需，于 1892 年 10 月设立了官办的萍乡矿务局。1898 年 3 月 22 日，官督商办的“萍乡等处煤矿总局”成立，创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以安源为中心、辖 120 平方公里矿区的煤矿。1908年，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合并，改官督商办为商办，组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近代工业文明比较早地渗透到了这一湘赣交界的地区。

上栗市是萍乡县北部的一个中心市镇，离县城约 40 公里，距湖南省浏阳、醴陵两县边界都不过 10 公里左右，水路可通长沙、汉口等地。这一带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和麻布等手工业发达，商贾小贩往来频繁。

张国焘虽然出生在这历史悠久、工业发达、山清水秀的地方，但他的祖籍却并不在此地，而是在遥远的广西。多年来，人们以讹传讹，都说张国焘的祖籍在江西省吉水县，其实不然。据《张氏以灵公族谱》记载：张氏原籍广西。不知何故，清初康熙乾隆年间从广西迁到萍乡。萍乡这一支的张氏始祖是“集翰公”，系张氏之第一百一十五代，为以灵公之第五子。迁到萍乡后，从集翰公开始，到张国焘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了。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客籍，倒也相安无事地居住下来，代代相传，读书入仕，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良田千亩、名震一方的地主乡绅之家。张国焘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说：

>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省试中取录的拔贡……。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

名”的。[1]

家庭，是人生立足的基地和起点，制约着每一个人的成长。张国焘的祖父为使自己的家庭沿着“功名”之途走下去，为张国焘的父亲设计了一条读书为官之路。张国焘的父亲张劼庄[2]没有辜负其父的期望，勤奋学习，在科举道路上一帆风顺，直至在省试中被录取为拔贡。然而，他似乎生不逢时，1905 年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制度。之后，他转入新式学校浙江法政学校学习。民国初年毕业后做过几年法官，后出任浙江省象山县知事。大革命时期当过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后又在南昌公路处做过秘书。张劼庄一生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官至几品，但也可算是功成名就了。如同生活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是一位主张“国粹”而偏于守旧的人，对革命起初是持观望态度的，并企图以自己的处世哲学去影响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但他又受到新的思潮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新式学校里接受新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的变迁。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仅伴随了自己一生，而且导致了后来与张国焘的激烈碰撞。

张国焘的母亲姓刘，生长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大户人家。家里人口不少，但不愁吃穿。刘家大院的花园里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几块横匾，不失几分雅致和气派。刘家世代读书，也算得上是一个书香之家。在嫁到张家之前，张国焘的母亲已出落成一个既擅长针线、又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

刘氏嫁到张家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自然是分内之事。她先后生养了 6 个孩子，四男两女。4 个儿子中，除长子张国焘外，二儿子名叫张国燕，早年病逝；三儿子张国庶， 1905 年生，1924 年在萍乡中学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 年秋冬之时，萍乡县城

党的小组建立，被选为党小组长，1926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30年5月27日在南昌被张辉瓒逮捕，不久即被杀害，1986年,中共江西省委发文,承认张国庶为革命烈士；四儿子张国杰， 1910年生，初中毕业后即回乡，挑起理家的重担。两个女儿中，一个夭折，一个后来嫁人。

张国焘就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他是长子，自然在家庭里占有重要的地位。“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毫不例外地影响着张国焘的长辈，他们把很多很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长子身上。他的出世，给父母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他们给他取名国焘，字恺荫。后来，又有了一个名字张特立。

在这个过着富庶生活的家庭里，不愁吃，不愁穿，幼年的张国焘有着受到娇生惯养的条件。父母虽对他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但对他的启蒙教育却是严格的。白天，当母亲闲下来的时候，便遥指着远山的奇峰，讲述祖辈传下来的神奇故事；入夜，月圆中天或是群星闪烁的时候，母亲便讲起美丽而动人的神话。母亲给了张国焘最早的启蒙。随着时代的变迁，父亲虽然没有像祖父那样为张国焘设计一条路，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时刻萦绕在耳边。父亲心里最清楚的是：儿子有了学问，长大才会有前途。为此，从张国焘三四岁起，父母就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这些中国传统的识字课本，不仅使张国焘认识了许多字，而且也诱发了他的求知欲望。除了读书认字以外，张国焘还开始练习写字，从描红摹字入门，临帖抄仿。父母的严格教导，为张国焘日后求学打下了基础。

乱 世 求 学

张国焘出生时，中国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走过了半

个多世纪。这时，正值一个动乱的年代。清朝政府昏庸腐朽，国势衰败，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恣意蹂躏中华民族，瓜分狂潮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大地。在张国焘出生前两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爱国反帝、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强音。就在张国焘出生后不久，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这场维新运动虽一时搞得轰轰烈烈，但最终以 1898 年 9 月 28 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杀身成仁，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国外而告失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于危亡，人民群众便试图以武力排外主义来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1900 年发生在北方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虽然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但是，最终也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人民的各种反抗并没有拯救中国，相反，内忧外患，交相煎熬，国弱民贫，日甚一日；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走向崩溃。1900 年仲秋，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逃亡西安，清朝政府的“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拜倒在侵略者的脚下，《辛丑条约》再次记录了中国的耻辱。在这种形势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奋起，以武力驱除帝国主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从 1895 年开始，他们积极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也先后都失败了。

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同样冲击着萍乡这块闭塞的土地，冲击着人们古老的生活方式。安源煤矿的创办，萍乡安源间铁路的开通，洋货的袭来，不仅使原有的手工业受到了严重威胁，而且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人们虽然还不敢去怀疑真命天子的气数已尽，但也从日益增多的抽丁派捐、纳税纳粮中，明显地感觉到了大清王朝的江河日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抗斗争，同样震动着萍乡的人们。光绪进士文廷式曾任翰林院编修，升侍读学士。 1895年与康有为等在北京发起强学会，主张变法图强，被革职。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这位萍乡人引以为自豪的老乡的遭遇，一时间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1904年 10月，由黄兴、马福益等策动的长沙起义虽遭失败，但对相距不远的萍乡人来说，也从中感觉到宁静已经打破，革命的风暴已经来到了身边。

对于年幼的张国寿来说，并不知晓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也不懂得反抗和革命，但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印上时代的烙痕。随着张国焘步入校门，他的生活和命运与这个时代的联系就越来越紧密了。

1906 年,张国焘 9 岁了。尽管这时已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张国焘的父母认为张家祖辈都是读书人，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成为识文断字的人。于是，他们把他送进上栗市的一所私塾里读书。

这所私塾是张国焘父亲的朋友廖石溪主办的，共有十几个学生，包括廖石溪的儿子和一些亲朋的子弟，全都寄住。张国焘也从此离开家，住进这所私塾，开始了正规的读书生活。

然而，时间不长，正常的读书生活就被一场革命的风暴打乱了。

1905年，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积极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旨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的武装起义。1906 年 9月，同盟会总部派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到湖南，运动军队，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在此之前，湘赣一带有很多会党组织。1904 年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失败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次年被清军捕杀，其旧部萧克昌、李金奇等在安源秘密联络矿工数千人。哥老会另一首领龚春台则在浏阳、醴陵一带发动会众。当时，湖南旱灾严重， 10月间人们已

感觉米珠薪桂，造成粮价飞涨，民不堪命。刘道一、蔡绍南来到后，刘留在长沙主持全局，蔡往萍乡策动龚春台联合各地山堂，成立洪江会，推举龚为大哥。龚春台利用饥荒，号召会众打下浏阳县城，开仓济民。随后，决定于丙午年（1906年）农历腊月底乘清吏封印时分 3路起义。后因消息泄露，清军突袭浏阳麻石起义总机关。

12 月初，龚春台等在萍乡高家台率众起义。12 月 4 日,起义军占领浏阳高家头,6 日攻克萍乡上栗市,7 日占领宜春县属慈化。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群起响应，起义军遍布附近几个县，推举龚春台为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声讨清朝政府“十大罪恶”,宣布废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起义得到群众的拥护，数日内增至 3万余人，屡败清军，声势浩大。清政府急忙调集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军队数万人进行镇压。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起义军事先准备不充分，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至月中，起义失败。

被史家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的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在短短的 10 余天里，这场革命的风暴就席卷了几个县，使人们亲眼目睹了革命的惨烈，给人们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回忆。就在起义军攻占上栗市前后，张国焘也经受了这场“造反”的洗礼。

起义军占领上栗市的前一天下午，廖石溪因事下乡去了。张国焘和同学们按照廖先生的吩咐，正静静地温习功课。突然，洪江会马上就要攻打上栗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人们恐慌地四处躲避，店铺也都关起店门，藏起货物。顷刻间，热闹的街道便变得冷冷清清。约摸下午 5 时，各街道入口处的木栅门都关上了，市镇和四邻八乡的交通被切断了。

私塾里也是一片惊慌。多数同学先后被急忙赶来的亲属领走了，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地跑到外面去看热闹还没有回来，张国

焘等几个离家较远的同学呆在私塾里，茫然不知所措。不一会儿，与张国焘同在私塾读书的四叔匆匆跑回来，引着张国焘和两个姓文的同学沿街走到一家豆腐店里，把他们从豆腐店的后窗吊下去，指点他们越过小河，循着河对面的大路向文家走去。

大约走了 2.5 公里路程，张国焘和两个小伙伴来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这时，夜色已渐渐逼近，3 个孩子饥渴交加。管店先生认为外面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便留下他们在店铺里吃饭过夜。半夜时分，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的大汉，醉熏熏地把 3 个孩子抱起来，放在店铺的柜台上，要杀掉他们祭旗。张国寿从梦中惊醒，吓得浑身哆嗦。管店先生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急忙过来劝说，并请大汉们吃喝一顿。大汉们闹了一阵，便很快离此他往了。张国焘等 3 个孩子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带着几分惊恐，重新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张国焘等 3 个孩子醒来，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铺里的货物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走出店门，只见一队队农民队伍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木棍、大刀、锅盖等武器，正由大路上走过。他们看了一会儿，才循着一条岔路向文家走去。到了文家，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他们到处寻找，才在屋后面的山林里见到了文家的大人们。文家和张国焘家是世交，大人们坚持让张国焘住下来，待风声缓和下来再回家。张国焘和文家的人蜗居在山窝中临时支起的帐篷里，过了 10 天光景，后又悄悄回到家里住了三四夜。在这期间，张国焘好奇地倾听着大人们谈论“造反”的种种事情，也感觉到文家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文家对于自家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这件事，显得惶惶然，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缘故。

局势渐渐平静下来，交通也恢复了，张国焘的家人也从躲避的山林回到自己的家中，并派人把张国焘从文家接回家。大人们

见他安然无恙，自然非常欣慰，但对于“造反”之事，仍然心有余悸。父亲叮嘱张国焘和其他小孩别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走动。

在张国焘回家后的不几天，进剿起义军的一支清军来到村子里。这是一群清军的绿营兵，俗称“绿勇”。他们来到张国焘家后，先挥刀砍去陈设在大厅里的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进行威胁。张家的大人们显得惊慌失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地与绿勇们周旋。不一会儿，当地的保正、闾正也赶来了。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绿勇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张家吩咐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一番。绿勇们酒足饭饱之后，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了。张国焘目睹这一幕，既感到恐惧，也略觉不满。

紧接着，又一个难题摆在大人们的面前。绿勇捕捉了一些农民、手工业者、挑夫等，关押在一座寺庙里，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前去指认“会匪”，以便就地正法。张国焘的父亲感觉为难，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于是用钱买通了绿营军的一个哨长。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等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子去代为办理。张国焘便是被挑中的一个。

几个孩子随着绿勇和保长来到寺庙里，见满庙都是诚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问是不是“会匪”，孩子们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敷衍过去。绿勇撤走之后，乡里人大都称赞张家的做法得体，陆续来到张家表示谢意，并拥抱张国焘等几个小孩子，连声夸奖。

经过萍浏醴起义的洗礼，9岁的张国焘还不可能懂得更多，但“造反”“会党”等概念已印在他的脑海中。后来他回忆说：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

么一回事。”[3]

风暴过去了，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张国焘也继续他的学业，所学内容无非还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五经”之类。但是，不等这些传统课本学完，萍乡就在废科举、兴学校的风潮中，出现了不只是读“四书”、“五经”的新式学校。

1908年春天，张国焘 11 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往位于县城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从此，开始了他童年生活的新的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由文廷式倡导兴办的。学堂的主持人多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们注重读经，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尤其不允许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的新学说侵入到学生的脑海之中。可是，学堂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多是一些年轻的激进人物，他们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些新知识、新事物。从此，在张国焘和同学们的脑海中，除了孔夫子这个圣人之外，还新增加了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梭等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他思想深处的一些传统的观念，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他带着满腹疑虑自问：难道西方也有圣人？他以惊奇的心情去涉猎各种新的知识，渐渐地，他受到西学的启蒙，开始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形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

在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建立和舶来品的输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的普遍反抗和抵制。这在萍乡也是如此。随着萍乡至安源间铁路不断延伸到株洲、长沙，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县城和乡间传播开来，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得祖坟不安，就是说火车头要每天往烟囱里投入一个小孩子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囱也要每天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至于各种洋货，同样被视为可恶的东

西。

可是，学堂里一位姓黄的地理教员却有不同的见解。他对张国焘等学生们讲，火车固然夺去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船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窑，洋货固然排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中国要自强起来，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能管理企业就好了。黄先生的观点，令张国寿等一大批学生为之倾倒。他们目睹火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去附和旧的观念，并以实际行动向旧的观念挑战。

一天，张国焘穿着洋布时装从县城回到家里，祖父见到孙子趋时弃旧的举动，怒不可遏，遂大加训斥。恰好张国焘的父亲从上海带回来洋灯和其他洋货，祖父更加看不顺眼，但又不好发作，只好走到一旁叹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有了这一次的“胜利”，张国焘更加趋向反对旧事物，小脚、鸦片、迷信、衙门成为他和同学们攻击的四大对象。但是，由于家庭的原因，张国焘的行动仍然落后于他的同学们。

反对蓄辫子，在当时被认为是反对清朝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人特别起劲的事情。1908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张国焘按照长辈的要求,在辫子上缠了一条白布孝带。从家中回到学校后，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张国焘不得不立即把孝带解下来。这件事使张国寿感到非常尴尬，大受刺激，他决心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反对旧事物的行列。

1909 年的一个晚上，星光暗淡，校园漆黑。几个学生聚在一起，用早已准备好的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并预谋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有可能，还要乘学监和所有教职员睡觉的时候，偷偷将他们的辫子也剪掉。结果，他们只剪了 29 个同学的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就被发觉制止了。学监舍监们如丧考妣，认为这是反叛的行动，更觉得自己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惶惶不可终日。萍乡教育会的会长喻兆藩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赶到学堂，非常沉痛而严厉地向全体学生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喻兆藩与张国焘家有亲戚关系，于是特别向张国焘和另外几个亲友的孩子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经过喻兆藩的多方疏通，这桩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更加严格，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各种“异端邪说”再行侵入，要学生们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尽管如此，同学中还是有人偶尔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违禁书刊，张国焘等如获至宝，暗中传阅。张国焘等还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那里，得到零星的有关时事的消息。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维新、保皇立宪，孙中山主张革命排满，以及革命派在各地发动起义和保路运动的消息，在学生中传播开来。渐渐地，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在一些激进的教员和同学中，还经常讨论洪江会起义及其失败的原因，对起义的失败表示惋惜，对清朝统治的敌视心理愈来愈烈。

在此期间，张国寿还结识了学堂里的老更夫。这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青年时代曾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不谈起过去的经历。到这时，受到日益高涨的反清情绪的感染，老更夫竟毫不畏惧地向张国焘等几个他认为可靠的学生讲起自己过去“造反”的故事。他还认为，洪江会起义的领导不力，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太平军。张国焘和几个同学非常敬重这位老人，称他是一位老英雄，经常请他饮酒吃饭，听他讲述英勇的往事。张国寿等听着听着，不知不觉中平添了几分向往。

封建统治穷途末路，清朝政府垂死挣扎，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将新军的编练于 1905 年推广全国，借以巩固其垂危的统治。以留学生和新式学校为革命温床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也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新军，以便接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1910 年至 1911 年间，张国焘的许多同学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向，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纷纷前往投考新军。张国焘这时才十三四岁，年龄较小，没有资格去投考新军。于是，他就热情地暗中赞助那些投考新军的同学。他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他在床上用帐被严密遮住，点上蜡烛，秘密填写各种证件，同学则在寝室内外放哨，传递暗号，以防舍监的查究。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的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萍乡，人们大为震动。张国焘的父亲特地赶到县城，把他接回家去。10 月 22 日，湖南长沙宣告独立。23 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31 日，南昌新军也宣布起义。一时间，江西各地纷纷起义，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 11 月 3 日爆发，革命派成立了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有些混乱，但革命终究是有声有色地展开了。

拥有大大小小 100 多口人的张家，对于革命是持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年轻的子弟外出，并要求男子们留着辫子，等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觉得大清帝国是靠不住了，但孙中山能否主宰中国还是值得怀疑的。张国焘和年轻的叔父及兄弟们对家长的要求极为不满，他们经常聚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终于有一天，家里的二十几个青年人在大厅里公然全都剪

掉了辫子。这对于传统化的家庭和守旧的家长们，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示威。革命的浪潮终于冲进了这个古老的家庭，家长们对这一幕大为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年轻的子弟们却对自己终于占了上风而高兴不已。从此，张国焘对弃旧趋新的兴奋，对清朝灭亡的称快，对概念上的革命的向往，再也无法抑制了。

中 学 时 代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皇帝，中华民国也于 1912 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当人们看到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飘扬在丽日晴空之下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举国的有志之士更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国脉民运的一大转机。但是，孙中山很快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中华民国刚刚呱呱坠地，又不得不在苦难中挣扎。辫子是剪掉了，封建专制的礼仪也大部分废除了，然而，社会的不安，人民的疾苦，世态的炎凉，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不少清朝的遗老遗少们摇身一变而成了满口新名词的时髦人物，一大批新贵登上了政治舞台，其昏聩腐朽，其贪婪无耻，其横暴野蛮，比起他们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酷的社会现实，同人们原来对中华民国的期望，差得是那么远。切身的痛苦，冲淡了人们起初的美丽憧憬。

萍乡县的都督衙门被裁撤了，县城的秩序也恢复了，但革命的特殊气氛也还保留了一些。 1912 年三四月间，张国焘回到了县城，进入萍乡县立中学继续他的学业。这所中学是由萍乡小学堂改成的，此时已由所谓新派人物主持。张国焘在读书的同时，依然关心着时事。

不久，革命派的重要人物黄兴光临萍乡县城。黄兴认为丙午萍浏之役与他本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乘回到家乡湖南之便，特

地来萍乡凭吊这块革命的发难地。萍乡中学的全体师生开会欢迎黄兴的到来，县城里许多时髦人物也都挤来参加，要亲眼目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采，亲耳聆听他的革命谠论。张国焘内心十分激动，参加了这次集会。也许是因为黄兴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不易听懂，张国焘对黄兴的演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对他的仪表堂堂和缺了两个手指，却在脑海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认为那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光荣标记。黄兴成为张国焘心目中的英雄。

张国焘继续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12 年 3 月，满脑子帝王思想的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革命和民主的浪潮，还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采取一些粉饰门面的手段，开始筹备召开国会。8 月，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积极参加国会的竞选工作。在这种形势下，一般革命人物多以为破坏业已告终，建设正在开始，应该转而注重于国会的选举运动。这种情势反映到萍乡中学，师生们对于国家前途多持乐观态度，开始安静下来教学读书。一些学生采取“革命行动”，捣毁了城隍庙，立即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不满。学校主持人也认为在民国成立之后，不应该再做此类破坏的事情，纷纷劝诫学生专心读书，不可再有此行。

1913 年初，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获得多数席位。此时，袁世凯终于露出了真面目。3 月 20 日，国会召开前夕，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 4 月,又未经国会同意,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以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 6 月,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江西。国民党人被迫起兵讨袁。7 月 12 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起兵，安徽、江苏、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地相继响应，宣布独立。但两个月后，这场被称为“二次革命”的讨袁战争失败。孙中山、黄兴再度流亡日本，国民党也被强行解散。袁世凯巩固了其独裁

专制统治。

袁世凯的权势炙手可热。萍乡县城和学校里一些假冒革命的时髦人物，多转而对袁世凯歌功颂德，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一部分教员却因此更加不齿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张国焘的许多同学在革命前后参加了军队，追随李烈钧讨袁。在湖口战役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下落不明，噩耗传来，张国焘深深地怀念和同情他们。同学好友的牺牲，给他以很大震动，他同情革命，开始试着做一些实际的革命工作。

有一位年长的陈姓同学，诨名叫陈矮子，常接待来往的革命党人，在反袁斗争中担任秘密交通的任务。张国焘和他见解相同，以密友相待。陈矮子对张国焘也不隐瞒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且经常要张国焘帮他做一些迎来送往或搬运违禁物品的工作。张国焘还常常因同情革命派的主张而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意。

在动乱的局势中，萍乡中学的校风每况愈下，学生们胡闹、赌博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1914 年 2 月，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几个学生赌博被发现了。学校要惩处这几个学生。张国焘挺身出来为他们辩护，指责学校管理不善，与舍监发生了争执。恼羞成怒的舍监认为张国焘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他的学籍。有些师友劝张国焘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被张国焘拒绝了。他决定到省城一所自己向往已久的中学去。就这样，张国焘告别了萍乡，抵达南昌，插入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创办的，初期以培养少数熊家子弟为主。后来负笈者众，遂成为南昌一所颇负盛名的中学。这所中学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张国焘来到这样一所学校，顿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起初，他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后来受了学校风气的影响，兴趣

更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在这期间，张国焘用心读完了英国人赫胥黎所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被书中阐述的进化的观点所吸引。从此，他终于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科学的大门。

然而，追求科学的愿望又被令人揪心的国事打乱了。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搅乱了校园里宁静的学习生活。9月2日，日本对德国宣战，派兵在中国山东半岛龙口登陆，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径自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11月7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一连串的消息传到心远中学，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慨，他们认为这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1915年1月18日，日本又悍然令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开，全国哗然。张国焘和全校师生也被极大地激怒了，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4]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时以前对日本的要求做出答复。袁世凯政府如期屈服，正式承认了“二十一条”。张国焘和同学们对这一莫大的国耻感到十分悲愤，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结伴走上街头，按照报纸上登载的新闻，向市民宣传反日，呼吁抵制日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